

論《世說新語》敘事文*

劉承慧**

摘要

本文將鑄造文學、歷史、思想意涵於一爐的《世說新語》視為敘事之作，從多重觀點切入，討論如何詮釋這部古典名著。第二節由句式和三十六門類體製辨認不同觀點在篇章的配置，以整合文本內部證據，亦有限度地採取外部的伴隨文本證據，作為詮釋依據。第三到六節從不同的角度細讀文本。第三節從人物發言慣用的套路觀察魏晉的思維定勢。第四節從記敘手法印證魏晉士人對自然的嚮往與情感寄託。第五節聚焦在魏晉門閥代表人物之一王徽之的言行，闡述他的生命歷程。第六節探討三十六門類的意義與價值觀。第七節提出文本詮釋模型。總之這部作品由敘事程式建置三種發言管道，傳達不同觀點下的態度與判斷；作者並沒有顯現自身價值取向，最後的詮釋開放給讀者自行權衡。

關鍵詞：世說新語、敘事、多重觀點、伴隨文本、文本詮釋模型

* 本文為科技部109年度計畫「《世說新語》語法修辭研究」(計畫編號109-2410-H-007-075)之研究成果，以劉承慧(2017)為基礎，進一步論證《世說》敘事文的特性，文中有小部分舉例為轉引，不一一註明頁碼。本文承蒙兩位專家惠賜審查意見，謹在此致上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本文從敘事文特有的多重觀點切入，討論《世說新語》（以下簡稱《世說》）細讀與詮釋問題。按照古典文獻的分類慣例，《世說》被歸類為志人小說，屬於文學。但《世說》內容是記實的。范子燁（2014: 107-111）指出，中古士人經常談論前朝人物，有時候是表示仰慕，有時候是標舉為品評的對象，《世說》即是劉義慶和幕府文士採集魏晉人物的舊聞纂輯而成。遼耀東（1998: 6-9）指出，就古典史學演進而論，《世說》屬於人物傳記為主的「雜傳」，起於東漢末年，東晉發展至高峰。可見它兼具載錄史料的性質。

再從成書的體例來看，《世說》係以三十六門類為綱領，分門敘事。除了〈文學〉外，其餘三十五門類的短篇都是依照東漢—曹魏—西晉—東晉—晉末宋初的時代先後編排；〈文學〉包含「經學、玄學、佛學」和「文學」，第 1-65 條屬於前者，第 66-104 條屬於後者，以下仍依時代順序編排。時代順序以下則集中記敘同一人或同一家族的事跡。¹

范子燁（2014: 39-54）主張《世說》三十六門類與魏晉選官制度「九品官人法」淵源很深，自〈德行〉到〈仇隙〉，每四個門類照應著九品模式中的一種品類；² 此係依循儒家傳統，始於〈德行〉終於〈仇隙〉，由褒而貶逐層遞減。然而另一方面，遼耀東（1998: 9）認為，從《世說》的人物言行可以看出個人意識在魏晉時代的覺醒，三十六門類排序「並不是以篇目多寡為秩，而是依個性的轉變與發展為先後的」；從〈德行〉到〈文學〉沿用孔門四科的名目，但卻承載新的內容，顯示當時處於思想的轉變期，〈方正〉到〈自新〉十一門或多或

¹ 摘錄自范子燁（2014: 19-20），詳細說明請參閱第 19-54 頁。

² 三十六門類與九品模式的對應關係見於范子燁（2014: 44）簡表。我們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還有斟酌的空間，詳見本文第六節討論。

少仍舊以儒家的價值觀為依歸，反映出兩晉人格解放的過渡期，最後的二十一門是迥異於儒家道德規範的個性類型，宜視作「魏晉思想與社會交互影響下的產物」。兩種研究對門類名目的看法分歧，仍有申論空間。

大抵《世說》採取五種方法纂輯舊聞，³ 以便配合門類宗旨；這種纂輯方法有時會出現片面徵引。以〈賞譽〉第 54 條記載「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為例，范子燁（2014: 23-24）認為這段話是從《語林》和《郭子》簡擇而來，若不簡擇，即形同王導自譽。更確切地說，這段話是刪除了《郭子》的最後一句「並一見而我服也」，同時不採錄《語林》所載王導發言事由。劉湘蘭（2011: 136-137）指出，《語林》記載重點並非讚美三人，參照東晉政壇的權力關係，這段話暗含王導對三人的戒備與排斥。《世說》單獨抽取出來編入〈賞譽〉，片面徵引的方式很接近子書徵引史事。

最後，寧稼雨（1994: 272）指出，《世說》的作者「能把自己的生活追求、審美情趣與作品中的文人相互作用，能從更為廣闊的範圍上，表現時代知識分子的面貌。總之，是作者自我的對象化，又是對象化的自我。」⁴ 文人將自我投射到歷史人物的書寫，讓《世說》帶有濃重的抒情韻致。

綜上所述，《世說》是鎔鑄史學、子學、文學意義於一爐的「敘事文」。本文由句式及不同觀點在篇章中的配置來解說敘事體裁程式，透過細讀揭示它的多元價值觀，以此歸結出文本詮釋的模型。

³ 范子燁（2014: 23-33）指出《世說》纂輯舊聞，主要採用簡擇、增益、拆分、兼存、附注五種方法。簡擇法是從舊聞中擷取局部；增益法是在舊聞基礎上增補資料；拆分法把同一條舊聞拆分為不同記載；兼存法保留舊有文獻中的分歧的說法；附注法是在文末附加說明，以利解讀。

⁴ 有關中古志人小說的源流發展及特色，請參閱寧稼雨（1994: 269-283）。

二、構成與詮釋

前面提到《世說》以三十六門類為綱領，分門記敘士人的言談行事，刻畫出魏晉人物群像。門類名稱如「方正」、「雅量」、「術解」、「忿狷」等，反映出魏晉士人區辨的人性類型。至於是否隱含褒貶，仍有商榷的餘地。全書以孔門四科為起始點，清楚顯現對儒家的尊崇，以〈仇隙〉為終點，貶抑也是不言可喻。然而居中的門類事實上容許不同的價值判斷。如〈賢媛〉不盡為褒揚，〈棲逸〉、〈任誕〉不全是貶損，無疑是詮釋《世說》不能面對的現象。

其次，收入特定門類的人物言語行為，按理說應與門類名目相符。王導對刁玄亮、戴若思、卞望之的評語收入〈賞譽〉，意味「察察」、「巖巖」、「峯距」是對三人的稱賞之辭，⁵ 內情卻另有曲折。這段評語起自孔坦勸阻晉成帝親自造訪王導的夫人曹氏。劉孝標引用《語林》說「孔坦為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驚痴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並於其後加注「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⁶ 由此可知《世說》斷章取義，劉孝標特意加注補充語境，以還原歷史。⁷

王導吐露他對孔坦的不快，是歷史事件，經過簡擇放入〈賞譽〉，成了他對同儕的品評；⁸ 此外參照當時政治社會情境，王導話中還隱

⁵ 大抵「察察」是仔細精明的樣子，「巖巖」、「峯距」應是以山的高險峻峭形容為人不易接近的樣子。《語林》原文作「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世說》轉錄為「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卞、戴的評語顛倒，但意思很接近。請參閱余嘉錫（1993：453）。

⁶ 請參閱余嘉錫（1993：453）。

⁷ 蔣凡等（2009：522）指出，王導行事風格寬鬆，有別於三人的嚴峻，這段評語是譏諷孔坦欺軟怕硬。但孔坦維護君臣分際的堅持，亦反襯出王導自恃有功的托大。

⁸ 王導這段話的譏諷對象是孔坦，為此而點出三人與自己行事風格上的差異；即便他的目的不在品評三人，終究還是他對三人的看法，不能說違反歷史事實。

藏著對三人的戒備與排斥，並不是「賞譽」所能概括。王導與刁協在朝廷中對峙的情事，亦見於《世說》其他的篇目。〈方正〉第 23 則記載晉元帝寵愛鄭皇后，打算廢長立少，改立鄭皇后之子為太子，王導和周顛認為此舉不妥，而刁協表態支持晉元帝。又同篇第 27 則記載周顛在吏部官署發病，刁協連夜急救，次日早上周嵩匆忙趕到，把迎上前去的刁協推開，到病榻前也不問病況，只一逕質問兄長周顛說，你渡江前與和嶠齊名，跟刁協哪裡有交情，話說完就走了。從〈方正〉兩則記載可知王導和刁協兩派是尖銳對立的，即便刁協刻意攏絡也無法消融，即印證《語林》所載王導對刁協等人的排斥，對比上述收入〈賞譽〉的品評，顯示《世說》並非單一價值觀的作品。

從門類的名目有沒有褒貶，到門類中的記載是否遷就名目而斷章取義，都是把《世說》當作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本文以「敘事文」看待《世說》係基於它將不同立場與觀點的言語和行為都收納到同一個文本，上述問題的答案將嘗試由敘事學的角度切入去探求。

敘事分析的首要工作是辨析敘事體裁程式。本文依循劉承慧（2016）分析《左傳》敘事文的思路，由「故事世界的營造」、「多重觀點的建構」、「介入說明」三方面加以分說。⁹ 其次是整合文本內部與外部證據。前面的舉例顯示《世說》不可能脫離中古政治社會脈絡，必須適度地援引文本外部的背景資料，才可能獲致較為周延的詮釋。因此本文將從外部證據的類型廓清舉證範圍。

（一）敘事體裁程式

王靖宇（2003: 23）指出情節、人物、觀點、意義為敘事的要素。

⁹ 兩部文獻的體例不同，但都具備故事世界，都是由多種發言管道創造出多元觀點的文本；本文採取相同的分析途徑，有利於對照兩種歷史敘事文的異同，探討古典敘事的傳承與分化。

但意義是由情節、人物、觀點所組成，故而與其他三要素並不在同一平面。人物、情節、觀點三者事實上也不在同一平面。情節包含人物的行為及言語活動以及人際交涉的動態歷程與結果，人物是情節的部件，與之相配的是發生的事件。敘述者將人物與事件組織成情節，敘述者的觀點就隱藏在由人物、事件、情節共同形塑的故事世界中。

故事世界的觀點體現在人物發言。人物發言就如同行為屬於事件，是情節的一部分。敘述者在情節中安排人物發言，目的是豐富情節，特別是不同的人物在各自立場上對同一事況或現象表態，即模擬現實世界之意念紛呈的樣貌。

那麼人物觀點和敘述者觀點又如何區隔？劉承慧（2011a; 2011b; 2013; 2016）指出，行為句是表述事件的主要形式，敘述者將行為句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連貫成敘事主軸；同時以主題句和事理關係句重現人物的言語交涉，編織為具有多重價值觀的意義合成體。這雖然是從《左傳》敘事文觀察所得，亦適用於其他敘事文，包括《世說》。

建構敘事主軸的行為句有「時間性」，人物發言使用的主題句和事理關係句缺乏時間性。行為句的時間性是源自事件發生在某個時間位置；就好比具體事物必然依存於某個空間位置，事件必然依存於某個時間位置。歷史事件均可在過去時間找到所屬的位置。¹⁰

此外表述新事況或結果的句子也指涉事件的發生，與行為句同樣屬於「動態句」。¹¹ 行為句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動態句，就在搭配行為者主語表明引發事件的驅動力。例如「晉敗秦」與「秦敗」都是動態句，後者僅只表述敗戰結果，前者同時表明驅動事件並致使結果產生的行為者。

¹⁰ 同樣地，虛構故事世界中的事件也可以在故事設定的假想時間找到它所屬的位置，因而無論真實或虛構的事件都可以納入敘事。

¹¹ 這裡稱為「動態句」，是從動態與靜態的對立著眼。如果著眼於它們在敘事文中共同表述故事世界發生的事件，可以合稱為「事件句」。

營造故事世界的動態句，主要是行為句。行為句由行為者主語搭配普通動詞謂語組成，動態特徵起自普通動詞的指涉被行為者主語激活。¹² 若不搭配行為者主語，則動態特徵有賴事件的推進激活。¹³ 試比較：¹⁴

- (1)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5.27)
- (2)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8.54)

以上是前面提到的兩則記載的原文。例(1)中「直云」引述周嵩的話，此外全用動態句。「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是對周顛社會聲望的說明，「那與佞人刁協有情」以詰問形式表態責備，都不具時間性。例(2)三個平行表述的「之」字形式是沿襲自《語林》的條件複句「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中的條件成分，用於獨立表述，就成了對刁協等三人待人處事樣態的描寫。說明、表態、描寫不涉及事件發生。

¹² 劉承慧(1998: 79)有一組對照之例：「魏絳戮其僕」(左傳·襄公三年)和「專祿以周旋，戮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動詞「戮」搭配行為者主語「魏絳」時，動詞指涉固有的動態特徵被行為者特徵激活，據此而構成表述事件發生的行為句。同一個動詞「戮」搭配條件主語「專祿以周旋」時，不表述行為活動，而是表述在主語所指情況下「該當處死」；謂語「戮也」由句末語氣詞「也」收句，又不帶表示戮殺對象的賓語，此時「戮」已經偏離固有的動態指涉。

¹³ 換個方式說，它們是在敘事時間軸上成為動態推進的一環，才確然表述事件發生。如果是單獨出現，也可用於指涉狀態的存現。例如「秦敗」若與前行事件形成前因後果的連貫關係，則動態特徵是可以確認的，單獨出現時則無法排除表述戰敗狀態存現的可能性。

¹⁴ 本文引用《世說新語》，均以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代碼標註，以利讀者查閱。

另一方面，例(1)開頭「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中的「夜疾」、「營救」和「小損」表述順時推進的事件。「夜疾」指新事況，「營救」指此一事況下的行為，「小損」則指行為造成的結果。它們的動態特徵是透過時間推進而激活，¹⁵ 以為導入前景的鋪墊，¹⁶ 「明旦」以下由行為句營造出一段因果歷程，即為前景。行為者主語是刁協與周嵩，行文中時有省略，攸關事件連貫，¹⁷ 不影響動態特徵的辨認。

由行為句營造故事世界前景並以動態句和靜態句區隔敘述者與人物觀點是古典敘事文的共性。除了敘述者與人物觀點，還有評議者觀點。劉承慧(2016)指出《左傳》評議者觀點由「君子曰」之類的史官評議呈現。《世說》的體例不同，評議者觀點由三十六門類的名目呈現。由於《世說》中的短篇統攝於三十六門類，評議者觀點的顯著性很高。然而例證顯示《世說》的門類觀點不全然能夠覆蓋故事世界人物的情感表露。試看〈賞譽〉另一則記載：

(3)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謝堂，于時清露晨流，

¹⁵ 更確切地說，「發病」和「病況好轉」的主語不是行為者，而是承受者。在這種情況下得憑藉時間軸上的動態推進確保它們的動態特徵。有意思的是「營救備親好之至」中的「營救」是搭配行為者主語的普通動詞，這裡表述刁協的行為，然而與「備親好之至」連用後，表述重點已轉為營救的積極態度。即便如此，由於出現在動態推進的時間軸上，仍確保了它的動態指涉。其餘請見正文說明。

¹⁶ 敘事文內部有「前景」(foregrounding)與「後景」(backgrounding)的對立，在我們看來，順時推進的行為句構成故事世界的前景，不搭配行為者主語的動態句所述事件與前景事件在相同的時間線索上卻不具備同等的因果驅動力，可以視為鋪墊因果歷程的後景。即「明旦」前面的成分為後景，接續成分為前景。此外還有一種鋪墊因果歷程的後景，不在前景事件的時間線索上也不具動態特徵，純粹是說明性質的，如例(3)開頭交代王恭與王忱交惡的緣由。前景與後景的辨析是敘事語言研究很重要的環節，惟囿於本文論旨，將另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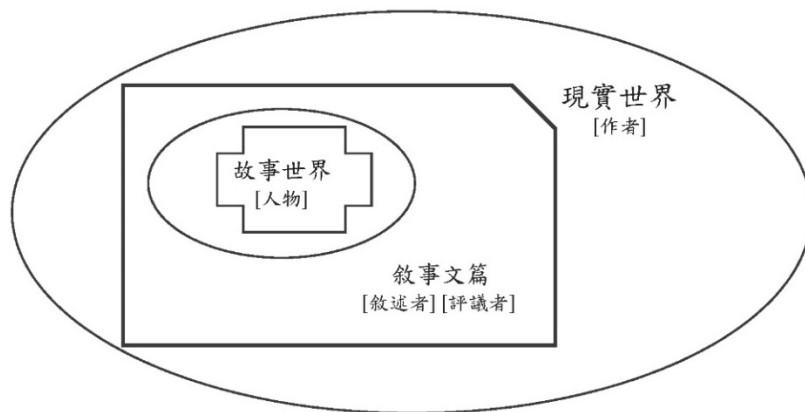
¹⁷ 行為者主語省略時，表示連貫的事件未被打斷。請參閱屈承熹(2006: 225)以及劉承慧(2010: 58-59)。

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8.153)

王恭和王忱的情誼因為袁悅挑撥而破裂，然而王恭時有思念；他某日清晨行散，看見晨露中梧桐發新芽，不禁聯想到王忱清新光潔的樣子。「王大故自濯濯」是這段記載列入〈賞譽〉的緣由，不過箇中意蘊不止於此——晨露中剛冒出新芽的梧桐樹充滿盎然生意，觸動王恭內心對王忱的純真思慕，流露的情感超出單純的賞譽。

敘事文傳達多重觀點，模擬現實世界中紛呈的意念與情感，因此有別於其他類型的文本。《世說》除了敘述者觀點、人物觀點，還在文篇最上層建構出門類觀點，本文依循劉承慧（2016），稱為「評議者觀點」。儘管具有史書性質，歷史人物言行及其引發的事件透過敘述者編織為情節，至多反映某個歷史面向的真實而不是全部的史實，因此本文沿用敘事學上術語「故事世界」稱說之。人物言語交涉顯示中古士人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也是模擬現實世界而來。

三種觀點在文篇中的配置，即如下圖所示：¹⁸



圖一：《世說》敘事文的構成

¹⁸ 本圖係仿照劉承慧（2016: 112）解析《左傳》的圖示製成，依據《世說》體例的實況而作出必要的調整。兩種敘事文觀點表達的異同之處，可以透過圖解的比較得悉。

圖中兩個大小不等的橢圓形，分別代表「現實世界」和「故事世界」；故事世界雖然不等於現實世界，卻是現實世界的模擬，故而使用相同的圖形。故事世界所在的「敘事文篇」以右上方缺角的矩形代表。「文篇」是我們從語言形式的構成方面給定的名稱，主要用於指稱「詞」到「句子」到「篇章」一層層建構出來的意義合成體。前面多次提到「文本」一詞，則是把文篇當作書寫活動的產物，為讀者的詮釋的對象。也就是說，文篇是著眼於作品的構成，文本則是著眼於作品意義的詮釋。¹⁹

敘述者和評議者位在故事世界外部，並非真有其人，毋寧是《世說》纂輯者呈現觀點的工具。就成書的狀況來說，《世說》的纂輯者就相當於敘事文的「作者」。²⁰ 敘述者編織情節，營造故事世界，人物觀點即屬於故事世界。評議者在故事世界外部為人物的言行作分類，分為三十六門類。圖中以十字形示意評議者觀點，十字形被包圍在橢圓形內，示意門類的概括力止於故事情節局部。²¹

作者位在現實世界。他不以單一視角統攝意義，而是任由故事人物、敘述者與評議者在各自的立場發言。以例（3）來說，評議者基於品評之辭「王大故自濯濯」而將它收入〈賞譽〉；王恭行散途中忽然想起王忱，則由敘述者道出，他同時說明兩人交惡緣由；王恭充滿情感的讚嘆係因晨露中清新的梧桐而發，瞬間情感是王恭個人的。

¹⁹ 兩者的辨析請參閱劉承慧（2016: 118-119）。

²⁰ 真大成（2020: 87）認為《世說》是「一種異時異質的衍生性文本」，參與文本生成過程的至少包括原創者、記錄者、編述者，過去以「作者」統稱——這是就文獻生成過程中有哪些參與角色而言。本文所謂的「作者」是指《世說》成書的責任者，即范子燁（2014: 55-97）提到的劉義慶及其幕府文士。無論纂輯資料來源如何，都是由他們負責取捨並收入不同的門類，縱或某程度地保有原創者或記錄者的見解，畢竟是他們作出最後的裁奪。敘事文作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置多重視角的體裁程式，俾便將不同立場與觀點的內容收納進同一文篇，據此而言，《世說》敘事文的作者是劉義慶等人。

²¹ 這裡「概括力」專指對故事的解釋效力。三十六門類框架無法充分解釋故事世界的情由，除了前面的舉例，下文將舉出更多的例證。

敘述者可以跳脫故事時間的限制，離線給予補充訊息。《世說》多數的記載都很簡短，敘述者不時介入增補必要的說明。如例（3）記敘王恭行散途中偶然被觸動情感之前，先說明王恭與王忱交惡的緣由及王恭的思念。²²

前面提到《世說》纂輯舊聞有五種方法，其中的兼存法和附注法亦經常透過敘述者介入的說明呈現。例如：²³

- (4)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14.20)
- (5) 宋禧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禧：「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9.21)

例（4）「或云謝幼輿言」意思是也有人認為評語是出自謝鯤，例（5）「鎮西妖冶故也」解釋何以宋禧用鄉下人和富貴人對照王敦、謝尚，都是敘述者介入提出的補充說明。²⁴

從體例來看，《世說》單篇記載經過三十六門類切割與編排，門類的價值觀籠罩在所有的單篇之上。不過從人物的言行與事件，仍可連結出超越門類框限的各種真實片段，是詮釋《世說》敘述者及人物觀點的重要憑據。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單篇僅止於載錄人物發言，任何發言都是特定交際情境下的意見表達，若要準確理解發言意圖，就必須追溯發言情境；如果不見於文本內部記載，就有必要連結到外部的伴隨文本尋求證據。

²² 此例中說明事由的謂語如「有情」、「遇衰悅之間」、「致疑隙」、「有相思」等，憑藉因果線索而非時間線索相連貫；「有」是存現動詞，「致」是致使義動詞，都不是普通動詞，「遇」是被動地遭逢而非主動地驅使；相關情事沒有明確標定發生的時間位置，有別於例（1）由動態句在敘事主軸上建構後景並順時延伸出前景，適合分析為背景說明。另請參閱註 16。

²³ 以下兩例分別轉引自范子燁（2014: 26; 29）。

²⁴ 其他的舉例請參閱范子燁（2014: 26-33）。

(二) 敘事角度的解讀與詮釋

就文篇構成的角度而論，三十六門類是《世說》設下的結構框架。如何跨出門類的限制，以便取得更豐富的理解？相同的問題也存於《左傳》——如何能夠超越編年體史書的限制，理解跨年份記載的重大歷史事件或者散見於不同年份的個體生命歷程？Talmy (2003: 464-470) 主張「同一性序列結構」(the sequential structure of identity) 是從敘事作品中理解意義的認知依據。²⁵ 劉承慧 (2016) 即以同一性為線索，將《左傳》跨年份記載的同一因果歷程的事件以及不同年份中同一人的事跡串接為意義合成體。同一性序列也是跨越《世說》門類體例以探索魏晉人物生命歷程的認知憑據。

然而隱含於敘述者再現之歷史人物言行背後的內幕，有時候不只是軼出門類框架，也超過故事情節。王導對同朝三人的評語，必須根據劉孝標注引用的《語林》記載才得理解與玩味。也就是說，除了掌握敘事體裁程式，還需要適度接榫文本外部的證據。

本文根據趙毅衡 (2012) 把相關的外部證據資料統稱為「伴隨文本」。他指出伴隨文本隨著文本，一起發送給訊息的接收者，如果我們要理解伴隨文本與文本詮釋的關係，必須先理解伴隨文本的作用：

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攜帶了大量社會約定和聯繫，這些約定和聯繫往往不顯現於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順便」攜帶著。在解釋中，不僅文本本身有意義，文本所攜帶的大量附加的因素，也有意義，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義。應當說，所有的符號文本，都是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結合體。這種結合，使文本不僅是符號組合，而是一個浸透了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構造。(趙毅衡 2012: 143)

²⁵ Talmy 所說「敘事作品」(narrative work) 不限文字作品。另請參閱劉承慧 (2016: 102-103)。

引文指出符號文本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依存關係。任何一個符號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對它的解釋也無法全然脫離社會文化語境。最廣義而言，凡是有關中古社會文化的文本都是《世說》的伴隨文本。

由此界定的伴隨文本近乎無邊無際，讀者可以隨著詮釋意圖將符號文本連結到特定的伴隨文本。趙毅衡（2012: 155）由「窄解釋」和「寬解釋」來討論文本詮釋的類型。他認為聚焦在文本之正文獲得的解釋是相對窄的理解，例如新批評倡導的「細讀」（close reading）；另一方面，大量參照伴隨文本的解釋是對正文的寬泛理解，例如新歷史主義的「全讀」（whole reading）。不存在絕對的細讀或全讀，任何的閱讀理解活動都是介於兩者之間而有所趨近。

換句話說，無論是全讀或細讀，都只是閱讀理解的途徑而非目標。本文意在細讀，一方面透過敘事體裁程式統整文本內部證據，另一方面有限度地擇取伴隨文本資料，以為深入詮釋的必要補充。進入細讀之前，讓我們先檢視趙毅衡認為具有普遍性的伴隨文本，以廓清本文採證之伴隨文本的類型與範圍。

表一內容整理自趙毅衡（2012: 143-159）：

表一：趙毅衡（2012）普遍性伴隨文本

副文本	顯露在文本表現層上的伴隨因素，如作者身分、標題、題詞、序言、插圖等	顯性伴隨文本
型文本	文本所屬之文化背景下的同類型文本	
前文本	引用、典故等是狹義的前文本，文本產生前全部的文化史是廣義的前文本	生成性伴隨文本
元文本	關於文本的文本，如對它的解說、評語、宣傳等	解釋性伴隨文本
鏈文本	接收文本的同時主動或被動地鏈接起來的文本	
先後文本	與文本有特殊傳承淵源的文本	

左邊欄位中的「副文本」、「型文本」等是六種普遍性伴隨文本的類別，中間欄位簡述每一類的範圍，²⁶ 右邊欄位中的「顯性」、「生成性」、「解釋性」是根據文本屬性的進階分類。

表二係按照表一的分類，大致梳理出《世說》的伴隨文本：

表二：《世說》伴隨文本

副文本	劉義慶及幕府文士袁淑、鮑照、陸展、何長瑜等人之身分資料 ²⁷
型文本	雜傳、小說
前文本	書中收錄的傳記資料、東漢到晉代社會文化史
元文本	敬胤注、劉孝標注、歷代注釋、 ²⁸ 當代注釋、 ²⁹ 當代《世說》研究
鏈文本	閱讀理解時連結的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先後文本
先後文本	先秦至漢魏雜家著作、魏晉以後「世說體」文本 ³⁰

表一中的副文本包括標題。雖然三十六門類名目看似標題，但沒有把它當作副文本，是因為就敘事體裁程式而言，門類名目並非正文之附屬，而是中古士人對人性的分類，與副文本性質不同。

對《世說》而言，最重要的副文本應該是纂輯者（作者）身分。《世說》被歸類為雜傳或小說，故而雜傳和古典小說都是它的型文本。狹義的前文本是書中所收錄的人物傳記資料，廣義的前文本包括中古

²⁶ 詳細的解說請參閱趙毅衡（2012: 144-154）。

²⁷ 請參閱范子燁（2014: 55-97）。

²⁸ 請參閱范子燁（2014: 113-135）。

²⁹ 本文最倚重的注釋本為蔣凡等（2009）。

³⁰ 請參閱寧稼雨（1994: 284-289），另請參閱本文第六節。

社會文化史。元文本是歷代學者注釋，除了釋義、批註、字詞增補與修訂，還應納入當代學者研究成果。鏈文本是閱讀理解過程中主動或被動連結的伴隨文本，其他五種伴隨文本原則上都是可連結的對象，但不可能在一次的閱讀活動中連結全部的伴隨文本。前文本是《世說》成書之前體例相仿的雜家著作，後文本為後世的仿寫作品。

本文以解釋性的伴隨文本為主要參照，包括劉孝標注以及若干當代學者注釋與研究。³¹ 我們由案例分析，具體展示如何藉助文本內部證據並且有限度地連結伴隨文本，細讀《世說》。

三、細讀之一：人物言語反映的認知³²

敘事文可分為「言」與「事」兩部分。歷史敘事中的人物發言，反映其所屬歷史階段的人群如何理解現實世界。從《世說》的對話來看，如果理解的方式與前代沒有顯著差異，語言形式的變動也不顯著。試看一段充滿古意的對話：

- (6) 劉琨雖隔閼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
(2.35)

其中「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子其行乎」、「嶠雖不敏」、「豈敢辭命」，幾乎是春秋士大夫的口吻。這種表現與其是極力仿古，毋寧是「為臣之道」的認知承襲自上古，故而有相應的形式套用。

如果對現實世界的認知發生變化，語言必然有相應的變化，《世

³¹ 書目見於文末引用文獻。

³² 本節為劉承慧（2017）文篇分析結果之進一步申論。

說》的對話亦反映認知上的變化。例如：

- (7)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2.70)

王羲之和謝安兩人登上城樓，引發謝安高遠遐想的言論，王羲之以夏禹、周文王為榜樣，批評他的高遠虛浮不合時宜。謝安反問說，縱使務實如商鞅，秦國也只歷經二世，難道是清談惹出的禍患？

在這段對話中，王羲之和謝安都拿古人和今人做比較；王羲之以務實為人民解決生存問題的夏禹和文王來跟謝安比較，批評他為政不務實，謝安搬出商鞅替自己辯解，最後以反問「豈清言致患邪」反駁王羲之的批評。

劉承慧(2017: 212-215)指出《世說》中的人物發言經常用比較，甚且形成比較與反問連用的固定格式，揭示流行於中古的思維定勢。文人套用此一格式來對照古人與今人(有時是自己)，申說今人行事的正當性。例(7)謝安套用格式強調秦朝非以清談亡國，為自己雅好玄遠提出辯解，然而辯解的效果僅是讓他從當下的困境開脫，事實上沒有辨明事理——秦朝非以清談亡國並不足以否定清談亡國的可能性，所以並沒有真正推翻王羲之對他主政不務實的批評。然而這一番談說到這裡就畫下句點。試問兩人對言語交際的結果是否滿意？

證據顯示這種思維定勢對士人是有精神約束力的：

- (8)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當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1.31)

- (9) 豫章太守顧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6.1)

例(8)記載有人勸庾亮把有害主人的「的盧」馬賣掉，庾亮不肯貽禍他人，就拿孫叔敖斬兩頭蛇作比較，說「效之，不亦達乎」，意思是自己仿效孫叔敖承擔禍害以免殃及他人，是豁達的表現。例(9)記載顧雍在一場熱鬧的聚會中跟人下圍棋，注意到信差並沒有捎來兒子顧邵的書信，當下明白兒子已死，但仍強忍以至於指甲把手掌都掐出鮮血，流到被褥上。等賓客散去，他拿吳國季札和魯國子夏喪子作比較，「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套用相同的格式，意思是自己終究沒有像季札般高人一等的修為，但也不要像子夏因哭泣過度失明，招致毀傷身體的不孝責難。兩人發言都隱含「到此為止」之意，表現為高尚的德行和豁達的風度。

若就此回顧王羲之和謝安的言語交涉，謝安套用格式應對的當下，亦有到此為止之意。又同一格式也經常套用人與自然的類比，人的情感就同步轉化為對自然的寄託：

- (10)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2.55)
- (11)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1.7)

例(10)記載桓溫北征經過金城，看見自己先前在當地任官栽種的柳樹已經成長為大樹，激動嘆道「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柳樹的今

昔對照引發桓溫對自己年華老去的感傷。例(11)記載陳謚被人問到他的父親陳寔有什麼功德，能享有盛名，他拿泰山坳處的桂樹做譬喻——桂樹「上為甘露所露，下為淵泉所潤」卻渾然不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以此塑造出陳寔自然天成的身影。

比較的結果以反問形式呈現，是無疑而問的強調。桓溫由「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把自己不堪承受的歲月流逝之重一逕託付給柳樹，而陳謚則以「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為陳寔的孤高風采定調。這同時，自然也是士人取法的對象：

(12)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
「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3.8)

山濤舉薦嵇康的兒子嵇紹擔任秘書丞，嵇紹向山濤請教是否應該出仕，山濤表示連天地四季都有消長，更何況是人。意思是起落乃人事之自然，要他擺脫父親被殺的陰影。山濤使用比較與反問搭配的格式，隱含著此外別無他意；勸嵇紹師法自然，同樣顯現魏晉士人訴諸自然的文化傾向。

下面這段對話甚至顯示大自然是某些士人最後的精神避難所：

(13)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
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24.13)

王徽之是桓沖的屬下，桓沖提醒他到職已久，該有所作為了，他都不回答，只是望著遠方，拿手版撐住面頰說，西山早晨極有爽氣。³³ 出身豪門的王徽之看不起桓沖，屈居下位卻無權沉默，於是「託言自然」成了他情急之下的歸處。

³³ 根據張永言主編(1992: 597)、張萬起編(1993: 111)，「致有」意為「極有」。

我們還可以從《世說》中人物品評的定型句式觀察到中古士人以自然事物為比較對象的偏好：

- (14)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14.39)
 (15)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14.6)
 (16)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14.30)
 (17)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14.4)
 (18)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14.35)

各例使用的人物品評之辭均套用固定格式〔A+如／若+M〕，其中A代表「形容成分」，M代表「喻體及譬喻情狀」。³⁴ 喻體如「春月柳」、「巖下電」等，無一不取材於自然。例（14）到（18）透過固定的格式將名士風采與自然相類比，亦可歸因於魏晉人對自然的情感託付。

四、細讀之二：敘述者的情景記敘

敘事文中的「事」委由敘述者鋪陳。劉承慧（2017）指出《世說》相較於《左傳》，記事的方式已有顯著差異。大抵《左傳》是短於描寫的，原因是史官側重記錄重大事件的因果情由及成敗責任歸屬。《世說》聚焦在個體生命現象，無論是三兩簡筆的人物描摹，還是情景交融的細膩鋪陳，甚或利用敘述者介入的手法揭示人物內心世

³⁴ 例（14）到（16）中「濯濯」、「爛爛」、「飄」和「矯」是形容成分，「春月柳」、「巖下電」、「遊雲」、「驚龍」是喻體；例（17）中「朗朗」、「頽唐」是形容成分，以「之」字偏正結構「日月之入懷」、「玉山之將崩」表示情狀，其中的定語「日月」、「玉山」為喻體；例（18）中「軒軒」是形容成分，「朝霞舉」則是喻體「朝霞」與譬喻情狀「舉」合成的主謂結構。

界的曲折，在在顯示敘事文書寫技法的變革。³⁵

有別於《左傳》，《世說》敘述者慣常以富於形象性的行為活動，重現人物的精神樣貌：

(19)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箬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6.15)

這則記載比較祖約和阮孚。兩人一好財貨，一好木屐，都經常的打理，同樣受到外物的羈絆，外界難以評判高下。有人去造訪祖約，正碰上他檢視財務，還沒有收拾好，於是斜著身體把兩個小竹箱擋在背後，意態顯得很不平順。有人去造訪阮孚，只見他自顧自的把火吹旺了，給木屐上蠟，感嘆自己一生不曉得能穿得了幾雙木屐，神色和暢。勝負就此分出。

例(19)先寫祖約，再寫阮孚，都是以行為陳述搭配神態描寫。「……餘兩小簾箬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勾勒祖約企圖遮掩貪婪的事實，猥瑣反被人看穿；而「……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顯示阮孚順應本性，展現個體精神。阮孚不經意間流露的玄想態度，即是他位列「雅量」的緣由。

人物言行直接反映中古士人的思想與情感。「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反映出阮孚將禍福難料之人生重擔轉移到對木屐的殷勤相待，箇中心理現實有賴敘述者營造的情景——訪客到達時阮孚自在地給木屐上蠟，對比於祖約的遮掩，更能夠彰顯出阮孚的風度。

中古士人對自然的嚮往與寄託，也顯現在情景記敘。如例(3)

³⁵ 舉例和說明請參閱劉承慧(2017)。

敘寫王恭和王忱的情誼因為袁悅挑撥而破裂，但王恭仍有思念，就在他目睹清晨充滿生機的梧桐樹的當下，觸動了內心深處的思慕——王恭的私密情感與周遭的自然景色即此無縫接軌，合而為一。敘述者透過情景記敘，展現士人如何受自然召喚。

下面一則記載顯示自然與人文合而為一的混同美感經驗：

(20) 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4.88)

此例敘寫謝尚與袁宏邂逅始末。袁宏年輕時曾替人幫傭，夜間在商船上吟詠自己所寫的〈詠史詩〉，剛好謝尚官船駛過；謝尚在清風朗月下，隔水聽見袁宏吟詠五言詩，詠詩聲融入自然美景所引起的愉悅讓謝尚進一步關注其內容，發現竟是自己前所未聞，遣人詢問又發現詩作出自吟詠者，於是大加嘆賞。

透過情景記敘，我們看到士人對自然的嚮往甚至是禁不住挑動的：

(21)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23.47)

例(21)記載夜間大雪誘發王徽之吟詠左思〈招隱詩〉的興致，忽然想起隱居的戴逵，竟連夜乘船去造訪，次日到戴門前，即反身踏上歸途。旁人不解，王徽之答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本則記載重點在「興」——皚皚雪白的一片天地促使半夜醒來的王徽之飲酒並吟哦左思〈招隱詩〉，未能盡興，立刻搭小船前去造訪

戴逵。何以如此？小尾郊一（2014: 61-72）指出，「招隱」這個名稱源自淮南王劉安署名的楚辭之作〈招隱士〉，只不過漢代的招隱是招喚隱士從山林歸來，而晉代的招隱卻是詩人自己到山林去尋訪隱士；又指出雖然先秦儒家已將「顯」、「隱」對觀，但對「顯」仍有執著，晉代對「隱」的評價是受到莊老哲學的影響而朝向讚美發展，引起文人對隱遁的遐想。王徽之此行顯然是以尋訪隱士為目的，「何必見戴」道出戴逵在這趟即興尋訪行動中無關宏旨。

五、細讀之三：魏晉門閥裡的個體生命

本文第一節曾引用遼耀東指出，《世說》後二十一篇的篇名標示魏晉新興的個性類型。「新興」應是就記載內容不見於前代史書而言。這些個性類型毋寧是對魏晉士人言行的分類。前面舉出的王徽之事例，例（21）收入〈任誕〉是取其率性而為，例（13）收入〈簡傲〉則是取其藐視上司。王徽之的記載多見於〈任誕〉、〈簡傲〉、〈排調〉、〈輕詆〉，³⁶ 可謂新興士人的一種典型。本節讓我們透過王徽之，探訪魏晉高門巨室中個體生命的日常。

王徽之因門閥作祟而不時流露出的簡慢自大，是魏晉豪門子弟的通性，但他還有不以俗事為務的個人風格。例（13）記載他答非所問地與桓冲應對，不僅是出自門戶上的輕蔑，恐怕也是因為他無心職務以致無言可答。另〈簡傲〉第 11 則是相近的記載。桓冲問他在官署的職掌，他擔任車騎參軍，卻含混用一個自擬的名稱「馬曹」；桓冲問他馬匹的數量，他斷章取義套用孔子的話「不問馬」自我開脫；桓冲問馬匹死亡數量，他又套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閃躲。³⁷

³⁶ 此外〈雅量〉、〈品藻〉、〈傷逝〉載有王徽之與弟弟王獻之的同事跡。

³⁷ 前者出自《論語·鄉黨》「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後者出自〈先進〉「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另一則記載顯示他隨性跨越門第與人交往：³⁸

- (22)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24.16)

王徽之行經吳郡某士大夫家，看到好竹園，前往觀賞。竹園主人灑掃相待，但他直接去到竹前諷詠長嘯，主人原本還冀望最後通報一下，沒想到他竟然要直接出門，主人下不了台，命令把門關上，這時候王徽之反倒激賞主人的堅持而留下來交際一番，賓主盡歡。

王徽之愛竹的癖好見於〈任誕〉第 46 則，他暫時借住空屋，住進去就要人種竹，人家問他暫住何必如此，他先「嘯詠良久」，然後「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任誕〉第 49 則顯示他內心寄託之物比人更重要：

- (23)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23.49)

桓伊擅長吹笛，王徽之旅途中在船上聽人說岸上路過的是桓伊，就派人下船請他為自己吹奏一曲，於是桓伊下車，坐在交椅上演奏了一曲，然後上車離去，始終沒有交談。「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客主不交一言」實有深意。王徽之出身門閥，桓伊因戰功而顯赫，背

³⁸ 此例與例（1）周嵩嫌刁協品次太低形成鮮明的對照。

景絕不相同，言語交談很可能話不投機，透過音樂更能夠喚起心靈共鳴。桓伊中途停車回應請求，與其是為了結識，倒不如是為了音樂的交流，此時言語對談形同蛇足。

王徽之自大任性，但他的任性並不全然是任意的。試看：

(24)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25.44)

(25)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25.45)

例(24)記載王徽之的舅父郗愔被任命為北中郎將，他前往道賀，座中幾次吟詠陳壽對諸葛亮的評語「應變將略，非其所長」，³⁹ 郗愔次子郗融對哥哥郗超抱怨王徽之出言不遜，然而郗超語帶調侃地說，人家把父親比做諸葛武侯，有什麼可抱怨的。其實王徽之的意思很可能也是借用陳壽的話，貶抑中暗藏褒揚，又以此炫耀自己的文化素養。例(25)記載王徽之去拜訪謝安，謝安問起七言詩，他以七字句「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作答。蔣凡等(2009: 988)指出有許多魏晉名士都熟讀《楚辭》，王徽之「熟練地化用《楚辭·卜居》之句，改為二句七言句式之詩」；又引用張萬起、劉尚慈的話，指出兩句意思是「寧願昂揚如千里駒呢？還是做泛游水中的野鴨，隨波起伏，以苟且偷生呢？」謝安出仕前隱居東山，詩句暗合出仕隨世浮沉或隱逸自由自在的情境。蔣凡等推論「大概因謝安與王羲之友善，父執名士，故子猷排調之時，尚存善意，這在子猷身上，似不多見。」(2009: 988)

³⁹ 劉孝標注引《蜀志》陳壽對諸葛亮的評語，請參閱余嘉錫(1993: 811)。

王徽之對謝安和郗愔態度迥然不同，其實有跡可循。高平郗家與陳郡謝家都與琅琊王家通婚，但王家對姻親卻有冷熱之別：

- (26)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度；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19.25)
- (27)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24.15)

例(26)提到的王右軍夫人郗璿是郗愔和郗曇的姐姐，她對弟弟說出王家的勢利眼——見到謝安、謝萬來，熱情相待；見到郗家人，平常而已。例(27)記載王獻之兄弟在郗超死後對舅父郗愔的態度丕變——郗超在世時，他們造訪郗愔都還中規中矩，是看在郗超權傾一時的份上，⁴⁰ 郗超過世後，態度就輕慢了。

即便是道賀仍不免用言辭擠兌郗愔，對謝安卻溫婉友善，可見要名士仍講究分寸。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郗超對王徽之有失厚道的言語表現給予寬容的回應「人以汝家比武侯」，可與另一則記載對照：

- (28)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毳毼，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郗無忤色。(23.39)

王徽之造訪郗恢，發現西域來的羊毛毯，就命人搬回自己家，還化用《莊子·大宗師》對郗恢說「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拿莊子為自己公然搶劫開脫；財物被侵占的郗恢卻沒有表示不悅，似乎這種往來的方式是理所當然。

⁴⁰ 郗超深獲桓溫倚重。〈雅量〉第 27 則記載「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另一方面，婚姻關係串聯的王、謝家族成員亦有較勁：

- (29)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譎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6.38)
- (30)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19.26)

例(29)記載謝安的姪子謝玄和王導的孫子王珉到王導的兒子王薈家聚會。王珉客氣地舉杯對謝玄說「奉使君一觴」，謝玄輕率地回應「可爾」，彼此間言語交際態度的不對等，激怒了王珉，於是兩人互相譏刺了一番。謝玄對王導子侄的傲慢是源自謝安家族地位提升。東晉王家比謝家先發達，謝安對兩家聯姻的態度可以從例(30)得悉。王凝之謝夫人是謝安姪女，即著名才女謝道韞，⁴¹ 嫁給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兩人的見識不相襯，從謝道韞向謝安細數家族叔輩及堂兄弟中出色人物而後恨恨說道「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可知。謝安以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而且人才不算差來開導她，毫無遮掩地說出聯姻的意圖。

身為王羲之第五子的王徽之就是在上述氛圍下養成他的處世態度。其實魏晉士人對同儕的評比不止於官場上或姻親間，即便兄弟之間亦復如此。他就被拿來和弟弟王獻之作比較：

⁴¹ 謝道韞最為人樂道的記載在〈言語〉第71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 (31)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6.36)
- (32)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9.74)

例(31)記載兩兄弟同處一室，忽然起火，王徽之即刻逃離，匆忙間連木屐都來不及穿上，王獻之一如平常叫喚左右扶持而後離去，被視為具有雅量。例(32)記載王家三子造訪謝安，王徽之和王操之說了些俗務，王獻之只有幾句寒暄。謝安以「吉人辭寡」推定王獻之勝過兄長。

下面一則記載很清楚地道出，魏晉士人在家族子弟之間作比較，背後有維護家族優勢的深刻用心：

- (33)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2.92)

謝安問，子孫跟自己有什麼干係，何以對他們有所期盼？謝玄回答，大家都希望芝蘭玉樹生長在自家庭院。

王謝家族子弟背負著延續家族光榮的期盼，往往導致他們希心高遠，懷抱不切實際的人生志向：

- (34)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9.80)

無論是王獻之讚賞的「井丹高潔」還是王徽之嚮往的「長卿慢世」，

主人翁都有超越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生想像。相反地，王家兄弟在人生實踐中並沒有真正離開官場。

貴胄子弟離不開門閥圈，圈外人同樣也進不去，使圈內圈外的言語交際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前面提到〈簡傲〉第 11 則記載的桓冲與王徽之的問答，未嘗不是圈內圈外的交際預設不同導致言語困頓？⁴² 下面兩例有異曲同工之妙：

(35)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25.43)

(36)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26.29)

例(35)記載某次王徽之造訪謝萬，僧人支道林已經在座，眉宇間流露出倨傲的樣子。王徽之問道，如果他的鬚鬚頭髮俱全，神情是否更勝？謝萬回答說，脣與齒相陪襯，與鬚髮無關。支道林惱怒地說，我堂堂七尺身軀今天就委由兩位賢達來評斷。⁴³ 例(36)記載前秦太子符宏歸降晉朝，謝安經常接待引見，符宏自恃有才而盛氣凌人，無人能讓他折服。剛好王徽之到訪，謝安要兩人交談，王徽之仔細端詳了好一陣子，然後回覆謝安說，他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兩樣，讓符宏大感羞慚地告退了。

⁴² 桓冲問「卿何署」，實暗含權力的傲慢。王徽之用「似是馬曹」胡亂敷衍，恐怕也是因為身在門閥，不知如何面對屈居兵家之下的窘境。

⁴³ 余嘉錫(1993: 810)根據〈容止〉第 31 則劉孝標注引《語林》之說「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參照此例王謝兩人所言，推論支道林脣齒有缺陷，解釋道「謝萬惡其神情高傲，故言正復有髮無關神明；但脣亡齒寒，為不可缺耳。其言譎而近虐，宜林公之佛然不悅也」。

支道林是長年遊走官宦家的名僧，然而「瞻矚甚高」的派頭未必能夠與高門子弟如謝萬、王徽之相投合；王徽之拿出家人落髮開玩笑本已不妥，謝萬竟加碼以唇齒相依來嘲弄他的相貌缺憾，可見兩人對非我族類完全沒有同理心。符宏與王徽之是平行宇宙的同類，兩人都極端自負而不顧他人觀感，都沒有覺察到只是因為自己享有特權才顯得出眾。符宏闖入了東晉門閥圈，終究是挫敗而返。

王徽之個人情感除了投注於自然與藝術外，似乎只投注在王獻之身上。下面這一則記載道出手足之情的深厚：

(37)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17.16)

兄弟兩人同時重病，王獻之先離世。王徽之平靜地要求備車奔喪，到了靈堂拿起王獻之的琴彈奏，弦音已不合諧，他一逕地把琴摔在地上說「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悲痛潰堤而出，不久後自己也離開人間。

此則記載出自〈傷逝〉，與同篇第 7 則記載很近似。顧榮生平好琴，他死後張翰前往弔喪，直上靈床彈奏數曲，而後痛哭一場，不顧「執孝子手」的禮數就走了。靈前彈琴的舉動應是模仿《莊子·大宗師》的故事——子桑戶死了，他的莫逆之交孟子反與子琴張在靈前編曲、彈琴並互相唱和以示意對死生的豁達。⁴⁴ 兩人模仿了彈琴行為，

⁴⁴ 故事原文摘錄如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莊子·大宗師》）刪節號省去的「孔

卻沒有展現相同的豁達。張翰藉著彈琴與顧榮作了最後的精神交流，撫琴問道「顧彥先頗復賞此不」，真率地釋放了悲痛。王徽之彈琴不成曲調，撫慰心靈的音樂竟然也隨著王獻之的辭世而消殞。

六、細讀之四：門類意義與價值判斷

前面提到，《世說》將魏晉士人的言行事跡打散，載入三十六門類，是成書體例設下的結構框限。但何以如此？

寧稼雨（1994: 284-289）討論「世說體」源流與發展，指出按照內容作分類早在秦漢雜家著作就已出現，而《世說》的分類有模仿漢代劉向《說苑》和《新序》的痕跡，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汰侈」等名目很接近《說苑》、《新序》中的「貴德」、「善說」、「理政」、「修文」、「刺奢」等。

然而不同的是《說苑》和《新序》分類名目與記敘內容緊密相扣，記敘後面有呼應類目價值觀的評議，敘述者與評議者觀點高度吻合。《世說》門類名目和記敘內容往往出自不同的視角，如例（3）載入〈賞譽〉而記敘的內容重在自然景物對人情的觸動，敘述者與評議者的觀點互有參差。

再看下面兩則記載：

(38)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⁴⁵ 不忍見行此事。」(36.8)

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向下繫連到子貢與孔子的問答，與本故事情節不相干，因此刪略。

⁴⁵ 余嘉錫（1993: 930）將「女等近過我餘年」合讀。這裡依據蔣凡等（2009: 1139）斷開。庾夫人這番話說得很破碎，先說你們是近親，再說等我過完餘年，又說我養育過他，不忍心見到這件事發生。連貫起來就是你們是近親，我又養育過他，是有情分的，活著的時候不願見到此事。由於這件事關係重大，庾夫人的言語破碎反映她內心紛亂。

(39)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19.14)

例(38)記載桓玄篡位前，桓脩打算趁著他在母親的住處偷襲，母親庾夫人表示有生餘年不忍心見到兒子對自己養育過的桓玄下毒手。例(39)記載賈充的妻子李氏著有《女訓》一書傳世，李氏的女兒是齊獻王妃子。後娶妻子郭氏的女兒是晉惠帝皇后。賈充死後，兩人都要自己的母親合葬，好幾年解決不了，等到惠后被廢，李氏合葬的事情就定案了。

前一則記載見於〈仇隙〉。桓脩是桓玄的堂兄弟，桓玄很看不起他。⁴⁶ 按照行文脈絡，桓脩企圖以君臣之義的大是大非為口實，除掉桓玄，被母親庾夫人阻止。「仇隙」應指桓脩意圖對桓玄公報私仇，然而記敘內容卻透露，要不是因為庾夫人對桓玄有情而出言阻擋，篡位大事就可能不會發生。後一則記載出自〈賢媛〉。李氏有才，郭氏悍妒，高下立判，⁴⁷ 但與賈充合葬憑靠的並不是當事人的才性，是政治勢力。兩則記敘的內容都超出門類名目設定的範圍。

儘管《世說》體例形式前有所承，門類名目與記敘內容卻不全然

⁴⁶ 根據〈排調〉第65則「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桓崖就是桓脩。又據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之說「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可證。請參閱余嘉錫(1993: 823-824)。

⁴⁷ 根據〈賢媛〉第13則「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又據〈惑溺〉第3則「賈公閻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可知。

扣合，顯示不同觀點交織的實情。那麼門類名目又代表何種角度的觀點？第一節指出范子燁和逢耀東對門類意義的看法分歧。范子燁把三十六門類與魏晉九品官人法的九個品次繫聯起來，每四個門類照應著一個品次，由褒而貶。逢耀東認為門類反映出魏晉思想的解放與創新，偏離漢代儒家規範的二十一個門類代表魏晉新興的人格類型。寧稼雨（1994: 291-293）提到劉宋時期並建「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學，儒學最盛，劉義慶為皇族成員，把儒家思想當作分類標準是很自然的事；但魏晉已經打破儒家獨尊，走上儒、道、名、法綜合的玄學道路，社會思潮發生劇烈的震盪，《世說》的主要資料來源是魏晉志人之作，如《魏晉世語》、《語林》、《郭子》等，記敘內容的複雜度超過儒家的規範，終究難以避免門類和記敘內容的扞格。

那麼如何將門類名目聯繫上儒家的價值觀？這裡我們先把范子燁（2014: 40-44）認為與《漢書·古今人表》四種品次相對應的十六門類整理成表格：

表三：十六門類的褒貶

上	上上	聖人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上中	仁人	〈方正〉〈雅量〉〈識鑒〉〈賞譽〉
	上下	智人	〈品藻〉〈規箴〉〈捷悟〉〈夙惠〉
下	下下	愚人	〈尤悔〉〈紕漏〉〈惑溺〉〈仇隙〉

左起第三欄是班固的分類，「聖人」、「仁人」、「智人」位列上品，「愚人」在下品最末。范子燁主張它們對應著《世說》前十二門與後四門，即如右欄所示。上上四門見於《論語·先進》，在儒家地位崇高。整體的排序由褒揚到貶抑，是不成問題的。

但其餘二十門的排序就顯得曖昧。試看范子燁（2014: 44）的簡表：

表四：范子燁（2014）三十六門類與九品的對應

上	上上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上中	〈方正〉〈雅量〉〈識鑒〉〈賞譽〉
	上下	〈品藻〉〈規箴〉〈捷悟〉〈夙惠〉
中	中上	〈豪爽〉〈容止〉〈自新〉〈企羨〉
	中中	〈傷逝〉〈棲逸〉〈賢媛〉〈術解〉
	中下	〈巧藝〉〈寵禮〉〈任誕〉〈簡傲〉
下	下上	〈排調〉〈輕詆〉〈假譎〉〈黜免〉
	下中	〈儉嗇〉〈汰侈〉〈忿狷〉〈讒險〉
	下下	〈尤悔〉〈紕漏〉〈惑溺〉〈仇隙〉

中中以下如「賢媛」介於「棲逸」和「術解」之間，或「巧藝」與「術解」分入不同品次，卻與「寵禮」、「任誕」、「簡傲」位列同一品次，都很令人費解。再者同為下品的十二門類固然都是負面屬性，整體排序依據仍是很模糊。

范子燁以〈古今人表〉照應三十六門類，有助顯示門類的褒貶傾向；寧稼雨根據劉宋統治者的立場認定劉義慶對儒家的維護，也有相當的說服力。或許可以說，《世說》的門類試圖比照「上上」到「下下」的九品模式，初始的價值基礎是漢代儒家，只是魏晉士人對人性的探索已經超過儒家，設立新的類別就成為不得不然。新設的類別缺乏齊一的標準，可見價值觀的多元化。

儘管魏晉思想解放，但士人的言行並沒有徹底拋棄儒家認知。且以〈賢媛〉為例。寧稼雨（1994: 292-293）指出〈賢媛〉符合儒家婦德形象的故事不多，有才能或有智慧的女性是很鮮明的賢媛類型。但魏晉女性並不排斥以舊時期的賢淑女子為榜樣。如第 11 則就記敘山濤的妻子如何引用僖負羈之妻的前例，說服他讓自己親睹嵇康和阮籍的風采：

(40)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19.11)

春秋時期晉國公子重耳流亡到曹國，曹共公聽說他肋骨有奇相，竟然趁著洗澡時偷窺，僖負羈的妻子見到重耳身邊的親信如狐偃和趙衰都是能人，就勸丈夫趕緊向重耳致意；重耳即位後攻打曹國復仇，但饒恕了僖負羈。⁴⁸ 僖負羈的妻子如何見到狐偃和趙衰已不可考，但是在暗地窺探重耳的人無疑是曹共公。「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比附失準，不過重點在仿效前賢——這是籠罩在儒家價值觀下為求行事正當性而經常採取的途徑，山濤的妻子顯然深諳此道。

門類名目和記敘內容之間的出入恰正反映《世說》兼攝多重觀點。例(38)載入〈仇隙〉，表明桓脩有意公報私仇，庾夫人基於情分阻擋下來，揭露歷史的偶然性。例(39)以「李氏作《女訓》」表明她是有資格與丈夫合葬的賢媛，然而後續內容卻顯示當事人背後的政治勢力才是決定因素。《世說》的「仿真」就在不同觀點交織而成的真相。

七、整體性的詮釋模型⁴⁹

自單篇走向整部著作，是本文細讀《世說》的進路。第三到五節從人物言語表現乃至敘述者由景入情的記敘手法，解說中古士人對自

⁴⁸ 請參閱楊伯峻(2009: 407; 452-454)。

⁴⁹ 審查意見提到《世說》後半部的條目數量較少，編排較粗疏，有可能是四十多歲英年早逝的劉義慶的「未竟之作」。我們認為這確實是合理的推論，只是不至於影響本文將《世說》視為組織架構完備的敘事作品的正當性。

然的嚮往和寄託，根據與王徽之相關的記載重建其個體生命歷程，主要目的在展示如何跨越分門記敘的體例侷限，更深入地探察文本意義。

王徽之放縱自我，藐視他人，耍弄才能，暗諷或譏刺不合己意的人與事，即如「任誕」、「簡傲」、「排調」、「輕詆」等名目所概括，也使得他成為門閥中荒謬人生的代表。然而三十六門類與故事人物不時流露的情感無關，荒謬行徑背後的感性往往被分類名目遮掩。門類、故事世界、人物之間隱含的微妙互動，有必要從多方面給予關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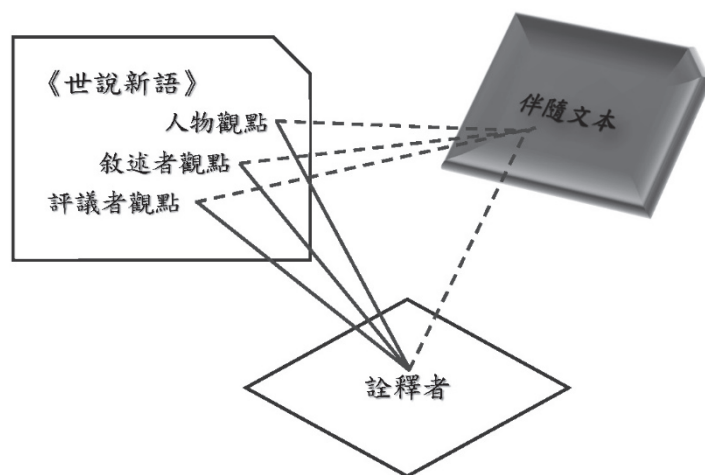
除了文本內部單篇的連結外，伴隨文本如劉孝標注引述的各種魏晉文獻也是細讀的必備資料。如例（38）有必要參照〈排調〉第 65 則及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才得確知桓脩與桓玄的恩怨。例（19）王徽之吟詠左思〈招隱詩〉，非但詩作的內容為必要，小尾郊一研究指出的漢魏時期「招隱」觀念的改變，同樣是必要訊息。敘述者說王徽之「忽憶戴安道」，他到戴門前卻說「何必見戴」，若不了解此舉重點在於「即興尋訪」，就可能把王徽之視為反覆無常。

正如第二節引用趙毅衡所說的，符號文本乃文本與伴隨文本的結合體，《世說》文本與劉孝標注、中古社會文化史，還有歷代文人注釋、當代的研究等伴隨文本結合為「一個浸透了社會文化因素的複雜構造」。⁵⁰ 細讀《世說》，除了連結內部其他有助於解讀的單篇，還要適度地連結外部的伴隨文本；連結不同，就會造成詮釋的分歧。連結的選擇主要取決於知識經驗背景以及詮釋的動機；即便是同一位讀者，也可能隨著人生閱歷的增長或詮釋動機的改變而有不同的理解。

儘管詮釋的可能性是開放的，詮釋的認知過程並無差異。大抵先於《世說》閱讀活動所累積的知識經驗加上《世說》與伴隨文本連結

⁵⁰ 這裡「社會文化」不止於作品創生的一時一地，詮釋者身處的時地，乃至被納入伴隨文本所屬時地的社會文化，都有關係。

後的訊息，經過詮釋者認知能力的統整，便取得詮釋結果。也就是詮釋活動涉及詮釋者對於各種資訊的綜合判斷，如下圖所示：



圖二：整體性的詮釋模型

圖中有三個形狀不同的區塊，分別代表文本、伴隨文本、詮釋者。伴隨文本總稱所有在詮釋過程中被連結的文本。連接《世說》與詮釋者的實線示意詮釋者與被詮釋文本的關係，詮釋者將三種觀點整合為某種詮釋結果。這同時三個區塊之間都有虛線相連：連接詮釋者與伴隨文本的虛線示意詮釋者在此之前所累積的知識經驗，而三種觀點與伴隨文本之間的虛線則示意詮釋者理解每一種觀點所依據的外部證據。

伴隨文本的選擇與連結方式取決於詮釋者。我們前面幾節針對《世說》記載提出的詮釋，都是以文本內部證據為主，僅有限度地選擇伴隨文本。那麼把伴隨文本的範圍擴大又將如何？再次以例（38）作推演。庾夫人保下桓玄，桓玄篡位但不久就被劉裕推翻，劉裕正是拔除晉恭帝的劉宋開國者。⁵¹ 本則記載作為《世說》終曲應非偶然。

⁵¹ 根據陳寅恪（1999: 204-206）的說法，桓玄趁著孫恩、盧循之亂起兵，短暫地奪下政權，同

文本與伴隨文本交錯雜揉，充滿各種意義連結的可能性，這使得敘事文詮釋必然是開放的。圖二提出整體性的詮釋模型不是為了朝向單一終極的詮釋，而是分梳意義的脈絡，以便照應現代讀者之間分歧的閱讀理解。

讓我們回到敘事文的特性上面。單一文本承載不同觀點，連結到不同的伴隨文本；連結範圍越大，可能繁衍的意義就越豐富。當代的社會環境與經驗是我們閱讀《世說》很重要的伴隨文本，不難想見當代的詮釋必然會出現前所未有的新解。然而若要講究詮釋的周延度與豐富度，仍不得不面對各種觀點之間的矛盾與整合。我們認為釐析出行文中的觀點配置是細讀敘事文的初步，透過句式和觀點配置分析而來的對敘事體裁程式的掌握是我們細讀《世說》的根本依據。

八、結論

本文將《世說》視為敘事之作，依循劉承慧（2016）闡述《左傳》敘事文的途徑，從《世說》體例以及句式與行文連貫方式，區隔出人物、敘述者、評議者三種觀點。出自評議者的三十六門類揭示中古社會對人性的分類，出自敘述者的故事世界重現魏晉士人的言談與行事，反映出不同視角所見魏晉生活面貌。人物發言則直接呈現魏晉士人的意念與情感。

門類位在《世說》篇章組織架構的最高層級，同一人言行事跡往往被切割為不同的短篇，歸入不同門類，讀者可以依據同一性予以合併。第五節把王徽之的記載合併同時輔以其他的相關記載，將「任誕」、「簡傲」、「排調」、「輕詆」所指具體化，揭示隱藏在名目背後的魏晉門閥家族成員的個體生命歷程。此外同一性還有不同的應用。第

屬東晉京口地區楚子集團的另一將領劉裕率兵討伐，先打敗桓玄，然後平定孫盧之亂，成為集團最具影響力的領袖，最終推翻東晉政權，建立劉宋王朝。

三節根據「比較與反問連用」的同一種發言套路歸結出中古士人極度依賴的思維定勢；從自然之物被設定為比較對象，推論自然為某些士人鍾情之所在。第四節從情景記敘的方式，印證魏晉士人對自然的嚮往與寄託。

又從第三節和第四節可知，《世說》在修辭上突破《左傳》敘事文對「史事真實」的追求，同時呈現人物的「情感真實」。如同寧稼雨所說的，《世說》作者將自身情感投射到故事世界——情節記敘緊扣住人物言語披露的情感，自然凝鍊為抒情的志人之作。

就歷史的角度而言，《世說》將同一人事跡打散，分門別類加以記載，以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因果內情被切割成不同的短篇，甚至造成誤導。然而若按照同一性予以整合，仍可拼湊出史事真實。如〈仇隙〉最後一則記載桓脩意圖偷襲桓玄，看似大是大非的背後其實是個人恩怨，見於〈排調〉。又王導對政壇敵手刁協等三人的評語收入〈賞譽〉，周顛是王導的政治盟友，他在王敦叛變使琅琊王家面臨存亡關頭的時刻挺身相救，見於〈尤悔〉，⁵² 又且〈方正〉載有周嵩對周顛救命恩人刁協的粗暴行徑，顯示兩方陣營如水火不相容，然而周顛卻在王導默許下死於王敦之手，亦見於〈尤悔〉。按照同一性把相關的單篇記載勾連起來所推知的「成片」的實情有時候反而是線性因果敘述無法簡單概括的。

再就門類名目與單篇記載內容之間的出入而論，即便是《世說》作者在纂輯舊聞之初有意透過門類的褒貶彰顯儒家道德，由於莊老之學與佛學興盛，社會上價值取向已趨多元，源自儒家理想的是非褒貶

⁵² 根據〈尤悔〉第6則「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可知。

也隨著士人生活的複雜度提高而變得模糊。如例(21)王徽之到戴逵門前隨即折返一事收入〈任誕〉，從不同角度看待，即有不同程度的褒貶。

單篇記敘不盡為褒貶；例(39)將李氏褒獎為賢媛，通篇要旨卻在政治勢力決定身後地位，與李氏的褒貶不直接相關。但又似隱含褒貶；王導對刁協等人的評語連同發言的事由大可以按照舊說收入相應的門類，卻將《語林》原句之條件成分「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單獨抽取出來，改為獨立小句，同時保留原條件複句中的「之」字結構，為讀者留下日後追溯來龍去脈的語言線索。這種纂輯舊聞的方式不盡然沒有褒貶。

劉承慧(2016)總結《左傳》敘事文研究時指出，魯國史官力求兼顧「義法真實」與「史事真實」，有時候必須廣泛參酌同一人的相關事跡，以便窺知史事真實。例如《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國宮廷鬥爭，直寫晉靈公的殘暴，卻側寫士大夫領袖趙盾如何受人愛戴；〈文公七年〉記載赤狄領袖鄆舒向晉人賈季探詢趙盾父子哪一位比較賢能，賈季說「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父子都好比太陽，養育萬物，但冬天的太陽予人溫暖，夏天的太陽酷熱難當。《世說》門類相當於《左傳》「君子曰」，表達「義法真實」，集合單篇所營造的故事世界則重現「史事真實」。如果把王導的評語和更多的相關記載連結起來，可以拼湊出更完整的真實。

如同《左傳》敘事文所顯現的，魯國史官讓史事和義法並行，多面向地展現春秋社會實況，《世說》讓史事和門類並行，其間的扞格之處反映魏晉世界存在多元價值觀。就如同魯國史官，《世說》作者並無意揭露他的價值取向，最後的詮釋交給讀者自行權衡。

(責任校對：胡昭儀)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宋〕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宋〕劉孝標注，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新注全評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二、近人論著

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屈承熹著，潘文國等譯，《漢語篇章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年。

范子燁，《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

真大成，〈論中古「衍生性文本」的語料意義——以《世說新語》為例〉，《中國語文》2020年第1期，頁86-100、128。

張永言主編，《世說新語辭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陳寅恪講演，萬繩楠整理，《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

遼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趙毅衡，《符號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劉承慧，〈試論先秦漢語的構句原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 69 本第 1 分，1998 年 3 月，頁 75-101。

_____，〈先秦敘事語言與敘事文本詮釋〉，《清華中文學報》第 5 期，2011 年 6 月，頁 45-87。

_____，〈試論《左傳》文句、文篇與敘事文本的對應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81-114。

_____，〈先秦敘事文的構成與分類〉，《清華中文學報》第 9 期，2013 年 6 月，頁 81-121。

_____，〈論《左傳》敘事文〉，收入李貞慧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99-133。

_____，〈《世說新語》文篇析論〉，《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207-224。

劉湘蘭，《中古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日〕小尾郊一，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以魏晉南北朝文學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Talmy, Leonard.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417-482.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3.

三、網路資源

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31 日。

On Narration in the *Shishuo xinyu*

Cheng-Hui Liu*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view the *Shishuo xinyu* 世說新語 as a narrative work that amalgamates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meaning and discuss how to interpret the tex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e article, I identify the disposition of different viewpoints in the text from both sentence patterns and the system of thirty-six categories in order to integrate its internal evidence. At the same time, and to a limited extent, my analysis also uses external textual evidence as a basis for interpretation. Sections three to six read the work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third section observes the mindset of the Wei and Jin from the patterns used by the characters in their speech. The fourth section confirms the WeiJin scholars' yearning for nature, and their desire to derive emotional sustenance from it, from the text's narrative technique. The fifth section focuses on the words and deeds of Wang Huizhi 王徽之,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WeiJin, and describes his personal life journey. The sixth section discusse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system of thirty-six categories; and section seven proposes a model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ll in all, the *Shishuo xinyu* employs three speaking channels established by its narrative program to convey attitudes and judgments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 author does not show his own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is open to readers to weigh on their own.

Key words: *Shishuo xinyu*, narrative, multiple perspectives, accompanying text, textual interpretation mode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